

文学及语言

文气诠释中的“隧道效应”问题

——以孟子、曹丕、刘勰为例

夏 静

【提 要】在传统经典的诠释中，我们常常看见这样一种情形，经典思想的核心要素（或问题意识）在不同时代的诠释者那里，被关注的焦点不同。后世的诠释者为建构自己的理论，带入了自己所处时代的知识经验，其中不乏有意地建构、刻意地修饰，也有无意地批评、不经意地陈述，等等，总之，以今释古，以己度人，或者重新编排各种要素的理论脉络与主次位置，或者仅仅关注并放大某些要素的地位与重要性，而忽略了其它的要素，从而出现了经典诠释中的“隧道效应”问题，形成经典解释传统中的种种复杂情形。

【关键词】文气 “隧道效应” “一体三相”

【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5)02-0096-06

经典诠释中的“隧道效应”(tunnel effects)，是源自现代史学研究领域的理论，是指经典诠释者常常将复杂万变的历史现象加以“隧道化”，从而形成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各个领域的问题，同时，于无意中假设各个隧道之间互不相关，由此形成历史研究的盲点，形成一种“隧道效应”。^①这个观点最早由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J. H. 赫克斯特(J. H. Hexter)在《重新评价历史》一书中提出。对此进一步展开分析的是美国布兰迪斯大学教授戴维·H. 费希尔(David H. Fischer)，在《历史学家的谬误：寻求历史思想的逻辑》一书中，他将这种研究的盲点称为“隧道历史的谬误”(the fallacy of tunnel history)。费氏认为经典思想的核心要素（或问题意识），假设它们最初包括A、B、C、D、E诸要素，随着时代的不同，这些要素在不

同时代的诠释者那里，被关注的焦点不同，出现复杂化和简单化两种趋势，由此形成了两种“隧道历史谬误”。一种是复杂化趋势，即后世的诠释者带入了自己所处时代的知识经验，以今释古，重新编排了A、B、C、D、E要素的理论脉络与中心位置，从而使经典思想变得复杂化、歧义化了；一种是简单化趋势，即后来的诠释者为建构自己的理论，仅仅关注并放大了E要素的地位与重要性，而忽略了其它A、B、C、D要素，从而使经典思想的内涵变得狭义化、单向化了。^②借鉴上述理论，为了具体说明这种

① J. H. Hexter,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London Longmans 1961, pp. 194-195.

② David H. Fischer, *Historian's Fallacies: Toward Logic of Historical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pp. 142-143.

“隧道效应”，也即由于不同时期的诠释者思想观念影响所形成的种种复杂状况，我们可以用文气在历代诠释者那里的发展演变为例，加以阐发。

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气说，综合了历代以来学者关于气学思想的见解，主要呈现为“一体三相”的特征：一是先天命定之气质禀赋、后天养成之心性道德，两者融合成为作者之气，包括作者之情、性、才、胆、识、力等；一是语言法则之体势声调、字句章法，这构成文本之气，包括文本之辞、字、句、音、韵、声、调等；一是作者之气和文本之气共同熔铸的作品整体性的生命形相（气势、情韵、意境、风格等），这就构成了传统文气思想的三个面向。从气之体用义看，作者之气相对于天地阴阳之气而言，是体用的关系；从文气之体用义来看，作者之气乃是体，文本之气、文章气象乃是用，也即内在之气为体而外显之文为用。从经典诠释的“隧道效应”视角，审视历代论者围绕文气三个面向展开的论述以及其中所蕴涵的问题意识，可以看到，上述三个方面的诸多因素在不同层面上，也在不同意义内交互作用、因果相联，使历代论者围绕文气的诠释，或兼顾左右、面面俱到，或单刀直入、片面深刻，呈现出颇为复杂的“隧道效应”。为此，本文将以孟子、曹丕、刘勰三位早期文气论者为例，进行深入一步的研究分析。

一

就气学解释的大传统而言，虽然孟子、曹丕、刘勰均有论文气的表述，也流露出颇为自觉的理论意识，但是，不同的时代聚焦形成了不同的问题意识与论证策略，他们在论气旨趣与方法偏好上，各有不同。对于诠释者的历史性，中国经典阐释传统的原则是还原去蔽，反对先入为主，要求体会原意，获得真知，孟子谓“知人论世”，庄子谓“虚静”，荀子谓“解蔽”，均蕴含了此一层意思。今人之所以能够理解或解释古人，就在于历史具有连续性，文化传统是一个连续不间断的、一脉相承的整体。

对经典的诠释过程，同时也是一种自我理解的创造性活动过程，用太史公的话来讲，就是“通古今之变”，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讲，就是“现在视域”与“过去视野”融合而成的“大视域”。因此，不同诠释者的历史时代性，是文气诠释中不可忽略的发生要素，只有通过这种历史性的揭示，才能使经典诠释中的“隧道效应”以及对于尔后研究的价值意义，为之豁然开显。

生活在战国中期的孟子，发挥了孔子以来儒学“向内”的思想脉络，虽然在其所处的“乱世”，学说难以奏效，但其理论的体系性及其内蕴的真知灼见，远在同时代的诸子之上，这一特点，在源远流长的孟学诠释史中体现得相当鲜明。孟子论气，整合了春秋战国以来的思想碎片，将气与心、志、言等要素关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旗帜鲜明的理论建设中，孟子思想的主轴不在气而在心，在于心性道德的生发与扩充，气论是为心性论服务的。同时，孟子关于主体之气的若干见解，如“浩然之气”、“知言养气”以及“心—志—气—言”的话语结构，开启了后世文气论结构形态的意义维度，亦发后世作者之气的先声，在传统文气诠释史中确有不可移易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①孟子所论主体之气，兼有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特质。在孟子与公孙丑讨论“动心”的前面，有一段文字是关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养勇”的方法问题，北宫黝之勇，是血气之勇，乃生理之气的表现；孟施舍之勇是志气之勇，乃心理之气的表现；曾子之勇是义气之勇，乃道德之气的表现，三者相比，以曾子之勇最得儒学精义。纵观战国诸子学说，虽然理性昌明为主流，但神秘主义思潮也时有泛起。汉初司马迁将邹衍传附入《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不仅指出了阴阳家与儒学的关系，也点出了邹衍“五德始终”与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以及

^① 关于孟子“心—志—气—言”话语结构的分析，参见拙文：《孟子气论在文学批评史上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4年第1期。

“浩然之气”所具有的神秘化倾向,^①包括尔后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出现,也是自有其历史渊源的。

虽然后代研究者,常常强调孟子“知言养气”的说法,由此也衍生出“养气”与“知言”关系诸问题,但就孟子所处时代的、并付诸行动的大语境而言,虽然以天地、道气、心性为核心构成的宇宙伦理话语系统,是先秦思想家的共同论域,但有关“气”的问题,并不具有本体意义上的优先性,也不是晚周诸子所关注的中心话题。通观《孟子》,除了有关“养气”的说法外,还有“养生”、“养弟子”、“养公田”、“养口体”、“养老”、“养勇”、“养君子”、“养志”、“养其性”、“养心”等说法,由此不难发现,就“养气”而言,作为一种论证策略,与其说孟子是在论“气”,不如说是在论“养”。这种对于“养”的功夫的强调,体现了孟子在实践心性问题上的创见。人欲立本体,以求本心的超凡脱俗,必须在这个世界上做一番圣贤功夫,人格才能得以完善,精神境界亦可由此得以充实。“知言养气”的重要性,就在于从知识和经验中去认识世界和完善自我,自孟子以来的儒家内圣一系,强调主体心性修养的功夫,对于价值主体的践行与实践性,如修身养性、培养本原等看得很重。尔后外王一系的荀子,虽然与孟子在人性论上相左,但同样有大量关于“养”的说法,^②可见在儒家的修养功夫论中,对于“养”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传统。

曹丕、刘勰生活的时代,思想界受到秦汉以来气化宇宙观的深刻影响,^③他们有关气的论述,并没有超出汉人气学解释系统的思路数与言说范式。曹丕的文气说,晚近以来学界流行的看法,认为涵盖作者气质、作品风格、文本语气等多重内蕴,^④这样的理解,是值得今天再思考的。现存《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这一段文字,核心观点有三:“文以气为主”、文气分“清”“浊”、文气“不能以移子弟”。“文以气为主”的说法,虽然是曹丕首次提出的,但在经历了汉代元气论的去实体化转向之

后,建安文学整体呈现“尚气”的特征,^⑤所以刘永济先生认为:“是则文气之论,虽发自子桓,实得于人心所同然。”^⑥至于气分“清”“浊”的说法,秉承汉人“以气定性”的先验论,基本上是老调重弹了。让人惊异的是关于文气“不可力强而致”、“不能以移子弟”的说法,明确了天赋,或者是气质禀性等先天质素对才性才情的养成乃至文学创作的决定意义,从而斩断了与后天之学的联系,这就有别于传统主流话语对后天教育教化的强调,其思想的深刻性与片面性也就同时呈现出来。至于曹丕论气的文字乃至整篇《典论·论文》,其中是否隐含着政治动机之类的“微言大义”这一疑问,由此也牵涉到“三曹”评价诸问题,历来是学者感兴趣的,相关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⑦

如同前文“隧道效应”理论指出的那样,

- ① 有关儒学传统中的神秘主义倾向,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小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陈来:《儒学传统中的神秘主义》,收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杨儒宾:《理学家与悟——从冥契主义的观点探讨》,收入刘述先主编:《中国思潮与外来文化:第三届国际汉学论文集(思想组)》,(台湾)中研院文哲所2002年版。
- ② 荀子强调“养”的多元性,如“养口”、“养目”、“养鼻”、“养体”、“养信”、“养威”、“养生”、“养财”、“养情”等,涉及到生理、物理、心理等各个方面。在其倡导的“全粹”之学中,“持养”也是自我修养提升的重要功夫。
- ③ 详细论述,参见日本学者三石善吉的观点,文章收在小野泽精一、福永光司、山井涌编:《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和人的观念的发展》,李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72页。
- ④ 就作者方面而言,指气质、个性、语气;就作品方面而言,指作品的风格。持气质、才性论者,如陈钟凡、朱东润、方孝岳等先生;持才气、语气论者,如郭绍虞、罗根泽等先生;持才气、风格论者,如刘大杰等先生。参见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大纲》、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刘大杰:《中国文学批评史》。
- ⑤ 关于建安文学的“尚气”特征,参见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页。
- ⑥ 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7页。
- ⑦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参见王梦鸥:《从典论残篇看曹丕嗣位之争》,(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51本第1分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0年版,第97~114页;胡明:《关于三曹的评价问题》,《文学评论》1993年第5期。

自曹丕明确提出“文以气为主”后，随着文学独立地位的提升，文学意义上的文气说演变为作者之气、文本之气和文章气象三个密不可分的面向。但在曹丕的思想里，所谓“清”“浊”之气、“不能以移”之气主要是指作者之气，同时也暗含作者之气在作品中的呈现，两者是统一未分的整体，就其本意而言，可能更偏重于前者。当曹丕判定“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并且断定“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的时候，他只是描述了一种主体之气存在的生命样貌与呈现的知识情态，并没有像我们今天明确区分出文气之“一体三相”以及主次轻重的问题。当然，曹丕以气来衡量文学作品的高下，而非先秦以来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政教立场，开拓了文艺创造的主体性与审美性维度，对于尔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深刻影响，是切切实实存在的。

二

齐梁时期的刘勰，虽然在当时并没有受到重视，但是作为理论家的刘勰，不像思想家的孟子那样急不可待地批评对手，也不像政治家的曹丕那样隐晦曲折地折射对手，而是更为圆融平和地谈文论艺。他不仅专设养气篇，而且在谈论其它问题时，也屡屡与气牵扯关联，其关注的重点不仅包括主体之气，而且对于与文章的章法技巧相关的问题，也极为关注，同时，对于作者之气和文本之气互动而呈现在作品中的整体风格气象，也颇为留意。比较而言，不同于孟子将气论融入心性论的路数，也不同于曹丕对气学传统的悉数吸纳，刘勰的理论整合与创新之处更为明晰一些。他已经将文气作为一个专门的问题来谈论，可以说，其理论体系意识的周全细密，从其文气思想中也可以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

刘勰论气，对于气之“一体三相”，均有不同层面的涉及，尤其对于作者之气、文本之气，

有相当明确地论述。《文心雕龙》一书中，与气相关的元范畴、次生范畴，屡屡可见，此一特质，近世以来的文气思想研究者多有关注，此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极为丰硕。^①全书“气”字出现，大约有八十余次，其中以词组形式出现的，有辞气、志气、血气、气力、养气、声气、才气、意气、体气、齐气、逸气、秀气、异气、韵气、精气、和气、素气、卫气、阳气、清气，等等。参之前文的“隧道效应”理论，我们可以看出，《文心雕龙》所论的为文诸要素，譬如情志、学养、才力、文采、辞章、事义、风骨等，均与文气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刘勰所论的文气，沿隐至显，因内符外，流动并充盈在才、学、情、辞、事、义、体等为文要素之间，发挥着枢纽与关联的作用。对于作者之气，刘勰称之为志气、意气、血气、精气，或者养气、守气等，虽有意义上的区别，但又具有本质上的贯通一致。对于文气与语言辞采、体式风格之间的关系，刘勰也是非常关注的。在《体性》篇中，他列举了八种文章风格：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对于八种风格体式的形成，他认为：“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②这就将文章风格的成因明明白白地归结到文气上面。分析刘勰所论的为文要素，不难发现，刘勰兼顾作者之气、文本之气和文章气象，在汉魏以来作者之气占据主导地位的文气诠释传统中，他采取了一贯的折中态度，把气之“一体三相”均纳入了理论的参照视野。

在刘勰“体大虑周”的理论建构中，以气为核心贯通作者和文本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在作者之气的阐释中，兼顾内外、先天后天；在文本之气的阐释中，文辞和音律并重，既重

^① 此方面的研究成果，参见拙著：《文气话语形态研究》“附录：气论研究目录”，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91~510页。

^② 刘勰著，詹锜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2页。

视文辞的技巧,又重视音律的抑扬顿挫,既探讨字、句、章、篇的技巧,譬如如何炼字、锻句、裁章、谋篇等技法问题,又论及比兴、夸饰、用典、隐秀、声律、对偶等修辞问题。对于文本之气这一曹丕时期隐而未显的问题,刘勰予以了充分的重视,并进行各个层面的深入讨论,这与六朝时期丰富的文学创作实绩相印证,从而成就了古代文气思想研究的一个理论高峰。总的来看,刘勰思虑周全,似乎旨在建构一个系统的气学话语结构,以期涵盖文学活动的各个方面。对于传统的气学思想资源,刘勰秉持的是一种整合新创的态度,这是他获得理论建构自信的精神源泉,也正因为具有这样的特质,从整体性、连续性的学术谱系考察,《文心雕龙》一书在气学解释传统中的地位也就显得颇为突出。当然,这种整合与新创,并不拘泥于“气”字的出现,也不仅仅在于风骨、神思、虚静、辞气、志气等次生范畴的使用,或者“风清骨峻”、“意气骏爽”、“梗概而多气”、“情与气偕”、“负气以适变”等气学家系列命题的发挥,深入一步看,对于汉魏以来血气与文气同源的气化宇宙生成论路数及其衍生的思维方式、论说模式,刘勰亦表现出一种深层次地接受与认同。

作为一种公共性的知识话语,古人对于气的论述,常常是价值和意义先于知识的,古往今来有识见的思想家,在对气的诠释中,总是要显现出某种价值指向,或哲学观、宇宙观,或人生观,经由气的解释而开出自我理解的新意,也成就了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重要特征之一,孟子、曹丕和刘勰也不例外。就气学解释的大传统而言,对于文气之“一体三相”,孟子、曹丕、刘勰的诠释,分别抓住了其中的不同面向,都倾向于对作者之气的强调,在他们各自的理论建构中,气并不是言说的重心,只是结构体系中的一个要素,重要性的程度也不尽相同。譬如同为作者之气的发挥,孟子“浩然之气”与曹丕“文以气为主”,论述角度也是很不相同的,前者就主体心性修养而论,后者

就主体先天禀赋而论,换言之,一个是倾向于后天之学,一个是倾向于先天之养,孟子和曹丕的不同,代表了气学解释传统中两种不同的路数。对此,刘勰虽然明确区分了先天才性和后天养成以及导致的内外之分,但他调和了后天之学与先天之养,较之孟子、曹丕,显得圆融了许多。一方面,他仍然将先天素质视为作者才略的先决条件,也明确地从禀气各异、长短相依的特点来评价作家才华;另一方面,在刘勰看来,性情虽自天生,但也要受到后天习得的影响,故辟专篇,如《定势》论“习”,《事类》论“学”,予以研讨。同时,刘勰之气,不同于孟子“浩然之气”的神秘特质,也不同于曹丕清浊之气的先验特质,刘勰论养气,既有道家式的被动存养,也有儒家式的主动培养,譬如《养气》篇偏于防御性的情性存养,《神思》篇则偏于主动的才气培养。同样谈养气,刘勰之于孟子,亦有很大不同。孟子强调主体心性之修养,所谓“知言养气”偏于积极性的进取,源于内在心性的培育,以刚正充沛为特征,这对于中国文学传统中强调作家主体性及道德人格有着极大的影响。刘勰论养气,重在顺和性情,使之勿衰竭、勿壅滞,这种对于自然之气资养、蕴藉的偏好,带有强烈的养生色彩,终究不同于孟子式的养气。

历史地看,自孟子发作者之气的先声,文气思想便呈现出复杂的演变态势,而曹丕论“文以气为主”以后,表现出更为多元、细分的趋势,尔后刘勰的解释,则出现了问题意识的明显扩展。具体来看,曹丕“文以气为主”的说法,谈论的是文与气的关系尤其是作者气质禀赋的问题,并不涉及到文本、文章的辞气与气象等问题。但是,当刘勰重新诠释文气问题时,就明确区分了作者之气与文本之气的不同。文学活动过程中的气,可以理解为创作主体以天赋的生命力为基础,加之后天学养的涵养充盈,藉由语言文字等为文技巧而表现出的文章整体风貌与气象,并在读者的阅读鉴赏中得以辉映生色。这种对于文气思想的解释,影响深

远，时至今日，我们对于文气的理解，大体上也是在这个范围之内。至于尔后的发展脉络，譬如到中唐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那里，遥承孟子“浩然之气”，怀抱对作者之气的高度自信，转而倡导文本之言辞声调与自由变化，以期代替文体卑弱、辞藻华丽的骈偶拘束，所以唐代以后的文论家，对于文本之气此一维度备加重视。清初叶燮的文气论述系统而完整，逮至桐城刘大櫆，强调神气与音节、字句等要素的联系，深刻性与片面性也就同时呈现出来。比较孟子、曹丕、刘勰以来论气的侧重点与问题意识，我们可以看到，经典思想在诠释者手中变得丰富而多样，这是一种颇为纷繁复杂的“隧道效应”，由此也成就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上源远流长的文气诠释传统。

在源远流长的文气诠释历史中，孟子、曹丕、刘勰既是经典的诠释者，也是新理论的建

构者，他们受到各自的时代氛围、人生际遇、学术兴趣、价值取向、情感方式等因素影响，出新解于陈篇，生发出种种关于作者之气、文本之气的说法来。经典的后代解释者从不同的历史时空进行回望时，受制于不同的历史性牵引，在历史客观性彰显与现实主体性发挥的两难处境中，建构起形态复杂的文气“隧道效应”历史，因而对于经典内涵的理解，在深度和广度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与经典写作者的原意必然有所出入，这种差异是所有经典诠释者必定遭遇的问题。有鉴于此，文气研究中“隧道效应”诸问题，以及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上所产生的纵横交错与相互辉映，也是值得未来研究中特别加以注意的。

本文作者：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马 光

The “Tunnel Effects” of Wenqi Interpretation

—Taking Mencius, Cao Pi and Liu Xie as Examples

Xia Jing

Abstract: In the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we frequently found such a situation that the core elements of classical thoughts (or the awareness of raising problems) focused on different focal points, by different interpreters in different times. The future interpreters took their own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which were formed in their age to construct their own theory. Much of them were intentional construction, deliberate modification, and also unintentional criticism, inadvertent statement, etc. In conclusion, the reason why the “Tunnel Effects” appeared in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was explaining archaic thoughts by our own contemporary views, or rearranging the theoretical context and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location of the various elements, or just focus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status and importance of certain elements, while ignoring other factors. These caused the various and complex situation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al tradition.

Keywords: Wenqi; “Tunnel Effects”; “Trinity”